

地区化的国际政治

——第四届北京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综述

吴彤 赵毅*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区主义研究重新获得活力。学术界对地区主义的新进展也充满了争论。地区主义究竟是推动了全球化和全球秩序的构建,还是与之矛盾?地区主义所创立的规范究竟是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是加剧了地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国应如何看待地区主义的发展并制定自己的相关战略呢?

就这些问题,2007年12月8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了主题为“地区化的国际政治”第四届北京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来自外交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0多位博士生和专家与会。

一、地区主义理论的进展

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戴颖认为,地区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共同体主义与普世主义对建设未来世界秩序的争论。地区主义研究历经了三个阶段:欧洲理

* 吴彤、赵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7级研究生。

论、发展中地区的学习与模仿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地区主义的新浪潮。欧洲地区主义理论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发展, 表现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联邦主义、沟通主义以及政府间主义等多种形式。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世界政治动荡, 欧共体发展减缓, 这些理论随之归于沉寂。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欧共体的新进展又使这些理论“复活”。戴颖指出, 欧洲理论的主要缺陷是, 对共同体内部的政治决策和民族国家的政策影响解释力不足。拉美地区一直试图突破西欧模式的束缚, 建立适合本地区的地区主义合作形式。拉美学者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来考察国际关系, 导致了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依附论的产生。亚洲地区本身缺乏主导国, 美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而以权力为基础的美国霸权理论成为亚洲地区主义初期理论建设的基石。随着对规范和认同在亚洲地区主义制度建构中的作用讨论增多, 亚洲国家国内政治的同质性成为该地区重点研究的内容, 并被认为是亚洲地区制度能否建立并发挥作用的关键。总的来说, 拉美和亚洲的地区主义理论更容易被人理解为欧洲理论在经济或者制度等具体层面上的再发展, 还不能形成独立的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点评时指出, 理论本身应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关系的命题, 理论研究切忌盲目。具体到地区主义的讨论, 目前众说纷纭, 我们应该搞清楚这些是否都可以称其为理论。在研究地区主义的时候, 仅仅对欧洲、拉美以及其他地区理论的被动接受是不够的, 做研究应该有自己的理解, 即对原有理论的“洞察力”。例如, 上述三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历史背景到底有什么不同? 是地理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还是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对地区一体化的影响更大呢? 为什么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动力不足, 这么多年来依然缺乏地区制度和合作机制? 是经济差距过大, 历史问题严重, 还是外部势力介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则从成本 - 收益的政治经济学角度, 提出了考察各个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公共选择问题, 即个体逻辑怎样形成集体逻辑并促进地区一体化的形成? 现行的全球性国际规则的合法性不够, 因为强势国家拥有对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力, 企图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大家的利益。从成本 - 收益角度来研究区域化过程, 可以关注一体化模型初步形成以后其合作范围是扩大了还是缩小, 程度是加深了还是降低了, 即通过对变化的了解来分析推动地区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

两位教授共同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地区主义的研究必须界定时间范围,大而全的主题很可能导致研究精度不够。第二,国内学者学界缺乏对地区主义理论的实证性研究。有了可行的思路和研究框架仅仅是个开始,还需要经验实证。对博士生而言,尤其需要加强史实、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综合训练。

二、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

地区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或者理念,影响地区行为体的战略选择,进而塑造地区秩序。东亚、非洲和拉美在创建地区主义架构的过程中,取得了什么成果,又面临何种挑战呢?

清华大学博士生许辉认为,东亚地区主义面临严重的障碍。第一,东亚的区域化存在着主导力量的争夺。中国、日本、东盟甚至美国都想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日本支持东亚共同体但不想中国成为主导力量;东盟担心推动一体化的努力最后为中国、日本或者韩国占据统治地位做“嫁衣”;中国虽然经济上日益发展,但时刻受日本的掣肘以及美国“离岸平衡”政策的影响。第二,东亚诸国缺乏合作的历史。古代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之间曾经存在的“华夷朝贡体系”,使这些国家可能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威胁”和“红色扩张”的阴影。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造成巨大的人员、物质和精神上的伤害。此外,东亚国家之间存在诸多领土争端。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东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第三,欧洲经验不能适合东亚。二战之后的欧洲联合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另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掠夺原材料和市场;而东亚各国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共同安全威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面临的压力也不尽相同。

关于非洲一体化的建设,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杨廷智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他指出,非洲地区主义表现为几对矛盾。首先,全洲参与性与组织松散性。非洲的一体化参与国多,53个国家都加入了非洲统一组织。但是,由于缺乏主导国和严格的制度规范,组织协调性不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其次,层次多、范围广但起点低。截至20世纪末期,非洲各地建立的次地区组织或合作框架近200个,国家间和次地区之间的合作同时展开但没能向深度发展。他认

为,脱胎于殖民地的国家在获取民族独立和基本的经济建设方面可以共同行动,当涉及到外交政策等“高位政治”时,非洲联盟基本没有建设性的成就。杨廷智指出,非洲一体化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一是历史包袱沉重,发展起点低;二是制度上还没有找到适合非洲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三是非洲国家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政治纷争不断;四是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大国干预。

在反思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时,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孙洪波把重点放到拉美区域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上。经济上,由于美国大搞与拉美地区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导致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易份额不足;政治上,过度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思想导致拉美地区凝聚力不足;大国、小国受益的不均衡性导致分歧增多;在主导国问题上,墨西哥过于亲美从而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共同认同不足,巴西经济长期处于颓势以及推行大国战略招致邻国嫌隙,其他国家则更不具备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总之,拉丁美洲的一体化首先是在美国推动下的南北合作,但发展一段时期之后,摆脱美国、联合自强的意图愈发明显,南南合作加强。因此,拉美地区一体化既要考虑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又要面对自身的诸多差异和分歧,防止分裂。

北京大学的王正毅教授在讲评时首先提出诘问:什么是一体化的定义?地区合作就是地区一体化吗?一体化有无具体的标准?他强调,研究必须有清楚的定义,也要深入阅读基础专业文献,减少重复研究。在进行区域化研究时,最好掌握相应区域和国家的语言。关于宗教和文化对地区主义的影响,他特别提出:“是否有独立于政治经济的文化存在?如果存在,对一体化的影响如何?”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强调,国际关系研究要防止落入描述现状、总结特点、概括问题、展望前景的“八股文”套路。他认为,做研究就要乐于思考“导致现象发生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尽量排除主体价值观的影响,对实际发生的事实冷静观察,批判地继承前人文献成果,做出自己的抽象概括,才可能取得科学研究的突破。

三、中国的地区战略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博士生周毅认为,冷战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

作的特点是: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与东亚主要国家建设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战略磋商和安全对话机制;增强与亚太各国相互之间的高层军事往来;积极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冉一磊提出,美国对区域主义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实力与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即能力与意愿的问题;第二是区域主义准则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理念。他认为,在地区层面上,推动地区力量的增长如果不是旨在排挤美国的影响,就不会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未必强烈反对这种地区主义。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的疑虑不是东亚和中亚区域主义的力量增长,也不是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而是这些地区推崇与美国明显不同的准则和理念。

清华大学的美国留学生司乐如在分析中国大力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时,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她认为,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上得到了俄罗斯和中亚的能源供给,政治上打击了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从而获得了安全利益。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提出可以真正为俄罗斯和中亚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或国际规则,因而中国实际上依然被排除在中亚之外。“硬”的军事合作远不如“软”性层面的融合更有意义,没有后者,上合组织的未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上合组织成为中国未来的“包袱”也并非不可能。

南开大学的硕士生陈小鼎分析了霸权护持下的美国地区政策。他认为,美国实现霸权的战略目标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第一,以物质途径发挥作用的地区政策主要表现为美国巩固和调整冷战期间形成的联盟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第二,以社会途径发挥作用的地区政策主要表现在推动区域民主化进程,逐步形成共享的社会结构,稳定霸权治理。换言之,通过“预防性”与“塑造性”相结合,一方面以物质途径保持权力优势,提升制衡成本;另一方面借助社会途径增强霸权合法性,削弱制衡动机。

中国社科院的范勇鹏博士分析了欧洲认同的建构过程。他指出,共同的历史文化经验和共享的价值观是欧洲认同的前提,这些经验的操作性强,非常值得借鉴。他认为,冉一磊的“意识形态理念”、司乐如的“软结合”,以及陈小鼎的“社会途径”有异曲同工之意,即共同体的发展不能单纯考虑经济因素,功能

主义或者新功能主义能否在一体化进程中实现并扩展必然受到认同建构的影响。东亚和欧洲同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阵痛,相对欧洲而言,为什么东亚一体化进展缓慢,从认同建构以及制度如何促进认同建构的角度更容易得到启示。

张宇燕研究员强调,在分析地区主义的战略选择时,重点应放在分析个体(个别国家)目标和集体(国家联盟)目标的差异上,要发掘出个体(国家)理性选择的条件是什么?国家在什么时候会作出理性选择?欧洲很早就有了建立联合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理念。但是,欧洲历史上战乱连连,如今一体化的趋势却不可阻挡。这里到底有没有路径依赖的问题?时殷弘教授指出,上述发言者都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在推动区域主义时面临的重要挑战是,中国是否具有可供输出和传播的普世价值观念?当然,在区域层次,所谓的普世主义并不“普世”,本质上不过是区域范围内的意识形态。

阎学通教授在总结中认为,地区主义、地区一体化、地区战略选择等问题中的诸多命题仍有争议,参与论坛的博士生能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摒弃空谈,扎实地进行实证研究,这必然深化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在今后的研究中,对前人工作的质疑不可缺少,相互之间的辩驳交流更为重要,博士生论坛为学术思想的交锋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希望论坛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